

УДК 94(571.6)«1920/1930»+327(510:470)+323.325

[俄] O. V. 扎列斯卡娅¹

国立师范大学

布拉戈维申斯克, 俄罗斯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务农侨民参加苏联集体化运动的作用 (1920—1930)

20世纪20—30年代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革命和社会主义转型的时期。在社会主义转型进程中, 中国移民积极参加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建设, 中俄务农侨民关系发展极快。中国移民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种地, 在远东地区气候条件下, 取得了显著效果。中俄人民在相互交往过程中相互学习, 为两国人民积累了最为宝贵经验, 为两国在跨地区和跨文明层面上的进一步协同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革命和社会主义转型的20—30年代内,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农民活动已经成为远东地域系统中的重要历史积淀, 同时也是俄中两国地区间和文明间协作关系发展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关键词: 俄罗斯远东地区; 中国移民; 中国集体农庄; 中俄关系; 中俄人民友好关系。

O. V. Zaleskaya

Blagoveshchensk State Pedagogical University,

Blagoveshchensk, Russia

The role of the expatriate Chinese Farmers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in Russian Far East, 1920—1930

The Far East Region of Russia went through revolutionary and socialistic transformation from 1920 to 1930. During this time and in this process, Chinese expatriate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area.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farmers cultivated farmland there, and it turned out that the cultivation methods of Chinese people were more effective in the climatic conditions of the Far East. Chinese and Russian people lived together and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thus formed the most cherishe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laid the firm foundation for further cooperation on a trans-regional and trans-cultural level. The Chinese farmer activity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during the revolution and

¹ 作者简介: O.B. 扎列斯卡娅, 女, 俄罗斯人, 国际系主任, 教授, 历史学博士。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in the Far East region. It had also become the inseparable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 and China relations.

Keywords: Russian Far East; expatriate Chinese; Chinese collective farmers; China and Russia relations; Chinese and Russian people friendly relations.

目前俄罗斯与中国的国家关系处于高水平的发展阶段,这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如今,地区层面的中俄关系对于两国协作关系的发展意义愈加重大。俄罗斯远东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帝俄时期、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有众多的、来自邻邦的中国居民参与到社会生活之中。在今日中俄关系的新时期里,华侨依然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1世纪中俄关系的发展进程中,不深入了解该地区华侨活动的历史就不可能有效地解决中俄未来长期协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19世纪中叶,中国人迁移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历史已经开始。随着1878年禁止或限制中国人移民法令和条列的废止,很多中国东北地区的人开始来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

中国工人季节性来到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有的是采取自发方式,有的是通过组织的形式。他们主要有两种路线:陆路(首先去中国东北,然后去阿穆尔州和滨海边疆地区)和海运(从青岛或烟台到海参崴港)。当每个中国公民过境时都必须出示由本国政府发给他的护照,并获得俄罗斯卡(居住卡)。从1858年到1860年,阿穆尔州和滨海区域领土上一共有8千多名中国移民,到1881年他们的人数达到1万5千多名。中国务农人员在阿穆尔州和滨海边疆区租赁土地,这对进一步扩大农业种植影响很大;中国大小商贩向远东地区提供需要的商品。随着中国工人廉价劳动力的进入,城市、道路逐步建成,远东地区的矿山得到开发。中国工人温和的性格、不求优越工作条件的工作态度和计较工资的高低品质都吸引了俄罗斯雇主。

中国移民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种地。比如说在1897年,阿穆尔州有33%的中国移民种地,滨海边疆区有11.5%的中国移民种地,他们种蔬菜、谷物和罂粟。俄罗斯农民积极地给中国人租地。在远东地区气候条件下,华人种植方式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效果。

中俄人民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俄罗斯人从中国人那里得知了人参的药物疗效和经济价值,同时学会了农业的种植经验;中国人从俄罗斯人那里学到了如何使用“犁”这种工具。

当从俄罗斯欧部到远东地区移民活动时，抵达阿穆尔州的俄罗斯农民也从事耕种养殖。但后来事实证明，中国人使用的农业方式得到了更好地收益。俄罗斯农民自己承认，从俄罗斯欧部带来的品种在远东地区种植差、不生根或无法生长，而所有来自中国的种子（小麦、燕麦、大麦、小米等）更好地适应了当地的气候。

中国的农民比俄罗斯农民种植技术更好。他们不使用机器种植农作物，他们付出了巨大地劳力，并通过使用阶梯种植系统开发种植困难的地域和斜坡，这是俄罗斯农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开发的地域。

俄罗斯农民在种植方面与中国农民相比竞争力不强的另一个原因是，秋季大量廉价蔬菜从中国东北进口到俄罗斯远东地区。耕地耕作方面，因为小麦也是从中国东北进口的，所以俄罗斯农民也不愿意扩大种植面积。在某些年份，当面包的需求增加时（俄日战争，移民的流入增加），阿穆尔地区的农业开始发展，但是在从中国东北进口量增加的影响下，农业发展的速度又变慢。

在俄国革命的年代里，远东地区华侨的经济活动并未中断。相反，正是华侨们用食品和工业品滋养了这块土地，使当地居民得以在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生存下来。这一地区不同时期的权力机关在对待华侨的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系列举措。在阿穆尔劳动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华侨获得了与当地俄罗斯居民平等的权利。1918年第四届远东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华工与俄工同等劳动条件的决议。确立了包括华人在内的各族农民与俄罗斯农民平等使用土地的权利。华人菜农因此获得了份地。限于客观原因，华侨的经济活动成为其融入当时俄罗斯社会的一个因素，与此同时也成为俄罗斯人在远东开发过程中的一个映像，在偏远地区的拓殖进程与俄国社会的转型进程的复杂条件下，华侨的经济活动成为该地区居民得以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 [1]。

在20世纪20年代末，按照苏联领导的指导和计划，新经济政策转向农村并发生巨大改变。但苏联国家工业化已经开始，飞速发展的工业化导致了城乡巨大差距，这种现象便引发出一场真正的经济灾难。斯大林和联共（布）政治局的成员都在寻找出路，力图解决因农业落后而给工业化造成的严重问题。做出的决定是建立大规模的集体生产以取代小农经济。进行集体化运动应该短时期内提供城市供应食品，完成进口和出口计划，制定指导工业化计划的措施。

1920年末，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农业集体化运动也开始了。那个期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农业方面，中国农民和朝鲜农民的作用巨大。

在1929年，统计有15万朝鲜人（其中干农活的有13.8万人）和5.5万中国人（干农活的大约有3千人）。

1929年在赤塔区已经有6个东方人的种菜作坊，其中中国人和朝鲜人一起种植的是——“莫斯科”、“广州公社”、“自由中国”、“东方人”、“国际”、“三一”种菜作坊。作坊成员积极地参与地区的公共生活：为了“第二个五年元年”计划，作坊劳动成员给国家捐赠了31万多卢布；并为中国红游击队捐赠了1万多卢布；为“高尔基”飞机的建设捐赠了640卢布。1933年，上述作坊的种植总面积为180.5公顷。

1926年，在赤塔建立了东方劳动者农民联盟会，联盟会中有赤塔及赤塔地区居住的200名中国人，并作为苏联农业和林业工人联盟会的一个分支被国家给予资助。联盟会有固定资金：从200到600卢布不等。联盟会的工作委员会成立了帮助失业者的基金。东方劳动者农民联盟会从事中国农民保险问题，协助劳动者签订合同，解决劳动保护的各种各样问题，在中国农民中免费分发“工人之路”报纸，把文盲的中国农民送到扫盲点[2，藏590，目录1，档案15，页26—28]。

1930年1月，哈巴罗夫斯克附近成立了水果和蔬菜专业作坊（“布留赫尔”，“广州公社”和“卡尔·马克思”），其中包括只中国农民，种植面积达234公顷。这些作坊在成立的第一年内，为哈巴罗夫斯克区劳动者蔬菜供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苏维埃中央机构赞成中国人的农耕方式，并宣布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种植东方传统农业食物（尤其是大米和大豆）是合适的。1930年11月21日，法律规定了1931年种植大米的面积——在中国和朝鲜移民的集体农社里不得少于1万公顷，中国和朝鲜农户不得少于5000公顷；并规定了1931年种植大豆的面积——在中国和朝鲜移民的集体农社里不得少于5000公顷，中国和朝鲜农户不得少于1万3千公顷。甚至有可能在海参崴和阿穆尔州地区建立大米检测工厂。

虽然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集体化完成期限被推迟到1933年春天，在1930年1月，俄罗斯远东26个地区已被宣布为全盘集体化地区。在1930年4月，吸收集体化的中农家庭已经占40%，而在一些远东地区20%的俄罗斯农民家庭被没收。

集体化活动并没有忽视俄罗斯远东地区干农活的中国移民。强制性吸收中国种菜农到集体农社引来了中国人的不解和不满。中国人指出，他们与朝鲜人不同，他们需要养活在中国的家人，不打算留在苏联，所以把他们归到集体农社是不合适和无意义的。政府

对于这些抗议实行制裁如下：拒绝给中国人可耕种的土地，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他们长出的食物，把那些不满情绪较重地中国人赶出了他们的住所。

农业集体化运动初期，在给中国公民提供土地问题上政策有了变动。为吸收中国公民加入集体农社干活，租地价格下降。此后，俄罗斯政府给中国集体农社提交了“永远使用土地权利书”。

从中国集体农庄数量来说，“集体农庄图案”中往往包括小规模数量的农庄。在1929年末，俄罗斯远东地区有1个大的集体农庄（包括45个农户）和32个小的集体农庄（包括352个农户）。我们也必须标出，一部分集体农庄（包括中国人、朝鲜人和俄罗斯人共同经营），经常被认为是中国的集体农庄。在1931年，俄罗斯远东地区曾有6个中国集体农庄和18个“混合农庄”。在1932年，俄罗斯远东地区算出16个“混合农庄”和中国集体农庄，这其中有13个中国集体农庄（包括675个农户、2287人）。

1931年，哈巴罗夫斯克地区有3个中国蔬菜作坊联合了最好的农民成立了“广州公社”集体农庄。1932年，该农庄有130个农户，总面积为245公顷。政府为农庄提供了离哈巴罗夫斯克8公里的农场，进行土壤调查后，该农场被确认完全适合农业使用。此外，哈巴罗夫斯克科学家在这些土地的小农户也被转移到“广州公社”集体农庄。1935年，在“广州公社”有120个农户。苏共党小组包括7个苏共党员，25—30个中国农民左右参加政治课，20—30个中国农民参加党会 [3, 藏99, 目录3, 档案95, 页9—10]。

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地区也有一个名叫“广东公社”集体农庄：在1932年，由8个种菜组（每组10—15人）组成了一个集体农庄，一共有85个农户。1933年12月，农庄被分成9个组。

在赤塔市区内有一个“苏维埃的中国”集体农庄，那儿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一起劳动，他们基本的劳动任务是种植蔬菜。在农庄有一个由8个中国菜主组成的党组织。农庄成员学习政治教育，一起大声朗读报纸，了解国家政治局势和国际局势。农庄开始组织扫盲教育机构，进行社会主义比赛活动。

1933年春天，俄罗斯远东地区“清洗政策”涉及到了中国集体农庄庄户。1933年4月23日俄罗斯远东政府宣布“关于必须把中国集体农庄消除“阶级抵融和反苏维埃政权的部分”的决定”。这个决定宣布后的两个星期，在“红色远东”中国集体农庄同样发生了“清洗政策”运动。“红色远东”中国集体农庄是1931年组成的，包括

252个中国农户。庄员管理局没有一个苏共党员，而仓库主任（中国人）是尼廓尔斯克乌苏里地区的大商贩，在中国也有个人小银行。庄员管理局成员完成了自己雇佣劳动的目标 [4, 藏2413, 目录4, 档案1744, 页124-125]。

在1930年，阿穆尔州坦波夫地区建立了中国农庄“东方工人”，其中10%是中农，25%是穷人，65%是以前的长工。1931年，农庄共整合了28个农户。与此同时坦波夫地区建立了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农庄（1932年，该农庄共有27个农户），1932年建立了“东方突击手”（1934年，该农庄共有25个农户）。1933年进行“清洗政策”时，“孙中山”农庄的大田农艺师以农庄种子失窃为由向法院提出了诉讼。在审理中发现，被告人是私人交换所和客栈的前业主。“东方工人”主席、主任以及一些组长被指控，他们从事走私活动把农庄的粮食和马匹销往中国黑河。农庄中教育俱乐部、苏联政治书刊、收音机等设备都没有。教拉丁文字的中国人什么工作都不干，也不讲课，因此被开除党籍。农庄成员大部分是文盲，并且对当下的政治问题等一概不知 [5, 藏1, 目录1, 档案134, 页18-20]。

1933年在阿穆尔州的伊万诺夫区建立了一座名叫“第二个五年计划”集体农庄。1934年，农庄买进了2个犁、2台割草机、4辆大车、4辆四轮车、1座房子、4座粮仓、2个大棚和一个浴室。农庄的种植面积从1933年的71.5公顷在1936年扩大到373公顷，总收益从1934年的2万5千卢布在1935年增长到4万2千卢布。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展作物的种类也发生了变化。例如，1930年在“东方工人”农庄一共种植了30公顷作物，其中15公顷烟草、2公顷大豆、4公顷向日葵和9公顷小麦。在1936年这个农庄种植了229公顷小麦、107公顷燕麦、9.6公顷大豆、5公顷土豆和2公顷蔬菜。这样一来，种植比重，尤其是小麦，从30%增长到65% [5, 藏1, 目录1, 档案931, 页6-8]。

农庄制定了生产计划，定期召开公共会议。地方政府组成了中国农庄机械的服务。一些识字中国农主的名字被刊登在“阿穆尔真理报”和“太平洋之星”（俄语版）、“工人之路”（汉语版）这些区报上。在集体农庄里定期运用巡回电影现场设备，1936年在孙中山农庄里就给农主放映了17部电影。在中国农庄里，成立了图书阅览室、托儿所等相应机构，并逐步得到发展。

1933年12月15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开设了预备中国农庄主席与组长学习班的课程。这一学习持续3个月，1934年3月15日，一共有35个学员，就像著名的“二万五千人”一样去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农庄

进行实际操作。在学习班里，有来自海参崴的3个苏共党员和2个共青团员，来自哈巴罗夫斯克的1个苏共党员和1个共青团员，还有从尼廓尔斯克乌苏里、斯帕斯克和布拉戈维申斯克三座城市各派的1个苏共党员 [3, 藏2, 目录1, 档案431, 页43, 108]。

1935年11月，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共有14座中国农庄，其中在阿穆尔州有5座，在哈巴罗夫斯克州有2座，在乌苏里州有7座。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总计有1200个中国农民，他们大部分娶了俄罗斯女人或乌克兰女人，这些通过种族通婚而出生的孩子的母语是俄语，他们很少会说汉语。

总的来说，在20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为了遵守苏维埃国家的法律，开始联合并加入集体农庄。中国农庄不能称之为纯粹的中国农庄，因为在中国农庄里中国农民和俄罗斯农民一起种地，一起生活。苏联中央和地方政府给中国农庄提供与俄罗斯集体农庄同样平等的权利，赞成中国农民长期使用的农业方式，非正式地为中国农庄提供了系统种植蔬菜的特权，并鼓励中国农民种植东方传统的作物。公正地说，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中俄务农侨民长期和睦关系和耕作经验的坚实基础上，中国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是中国移民融入俄罗斯远东地区社会的重要方面，适应俄罗斯居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我们的研究表明，在革命和社会主义转型的20-30年代内，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农民活动已经成为远东地域系统中的重要历史积淀，同时也是俄中两国地区间和文明间协作关系发展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1. O. V. 扎列斯卡娅: "1917—1938年的中国移民在俄罗斯远东地区", 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社2009年出版。

2. 外贝加尔边疆区国立档案馆。

3. 哈巴洛夫斯克地区国立档案馆。

4. 俄罗斯国立远东历史档案馆。

5. 阿穆尔州国立档案馆。